

如何防範「港獨」活動越來越多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拿來惹是生非、衝擊法治，令人嘆息，部分大學生甚至要以「違法達義」的名義與國家政體相對抗，與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作鬥爭，顯得幼稚而狂妄。

未重視國家認同教育

為何現在的「港獨」活動越來越多呢？追溯起來，當然與教育、教育政策的偏差，部分媒體的誤導脫不了關係。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教育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從教育上看，這項工作做好了，才可以解決「港獨」的根源。但從法律上看，卻與香港特區地方性政權機關對刑事政策和個案處理未必得當有關。這種不當可能散佈錯誤的信號，提供誤導性示範。

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問題，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如果現任行政長官未能提供立法的具體準備時間和時間表，至少應當明確表示在第23條立法實現之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認為不抵觸香港基本法、得以過渡的香港原有法律完全可以適用，有的經適應化可以適用，有的可以直接適用。這樣有利於宣傳「一國

兩制」，且對蠢蠢欲動的「港獨」分子也具有阻遏力。

如果行政長官或律政司司長不願意或不敢如此確認或宣告，就等於不當默認：在第23條立法實現之前，香港存在法律真空，危害國家安全的有關嫌犯無從治罪。這種不當默認也是一種刑事法律政策的「宣告」，這違反了1997年2月2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也與1997年回歸後上訴庭對「馬維騷及其他兩個人案」的判決不符。

這種默認或不作為，屬於嚴重瀆職。如政府認為有關犯罪行為因法律真空不會受到懲罰，有關類似犯罪行為就會有恃無恐，不斷發生。而其中的大部分的違法事件甚至是犯罪行為是錯誤以為香港具有法律真空造成的。有效法律不能形成懲治、威懾、教育青少年的社會，很難說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個不是法治的社會是很難進行管治的。

香港原有法律經適應化可適用

今年9月24日，「新界關注大聯盟」的鄧先生，因港大副教授戴耀廷3月25日在台灣出席「台灣」分子論壇，發表分裂祖國、煽動「港獨」的言論，以私人訴訟方式向香港法院提出控告。據現任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先生報上撰文，他徵詢了擅長刑事檢控的一位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認同戴某人已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9-10條的煽動罪。由於對該等犯罪的檢控要經過律政司司長同意，遂促請司長進行檢控。該

檢控的時效為6個月，在司長沒有表示、沒有作為的情況下，鄧先生只好在限期前提出個人訴訟。

鄧先生的個人檢控，是否受理，筆者不得而知。從常理推斷，不獲受理的機會居多，但這並不意味着有關犯罪就可以逍遙法外。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第1款第(a)項的規定：「任何人意圖達到廢除女皇陛下作為聯合王國或女皇陛下其他領土的君主稱號、榮譽及皇室名稱的目的」，「並以任何公開的作為或以發佈任何印刷品或文件表明該意圖」，就觸犯「叛逆性質的罪行」，可處終身監禁。

又據上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該項條文是可以適應化的，「女皇陛下」可以以「中央政府」替換，「聯合王國或女皇陛下其他領土」可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替換，「君主稱號、榮譽及皇室名稱」可以以「管治」替換。這樣上述規定經適應化就可以解讀為：「任何人意圖達到廢除中央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的目的，並以任何公開作為或以發佈任何印刷品或文件表明該意圖」，就觸犯了「叛逆性質的罪行」，該罪相當於「煽動分裂國家」的犯罪。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63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又據《刑事罪行條例》第4條的規定，「叛逆性質的罪行」的訴訟時效為3年。由於「叛逆性質的罪行」的訴訟時效較長，主管刑事檢控的律政司應有足夠的時間處理。

美國戰略調整與中東亂局

尹承德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前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參贊

在本屆聯合國大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空前猛烈地攻擊伊朗，並聲言要對伊施加更多更嚴厲制裁，還威脅要制裁同伊做生意的國家與公司，意欲通過扼殺伊經濟來搞垮伊政府。這是美推行超強硬反伊政策的新表現，也是它在中東推行極端霸權戰略的一個側面。

後冷戰時期，美實行獨霸中東戰略，以支持以色列坐大和對異己國家實行政權更迭全盤西化地區國家為目標。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為適應戰略中心東移亞太的需要，美中東戰略有所收縮，政策趨於務實。

美在中東改推強霸戰略

特朗普上台後，他反奧巴馬之道而行，在中東變本加厲推行強霸戰略：退出伊朗核協定，對伊恢復並強化全面制裁；大力支持以壓巴，承認耶路撒冷為首都並將美駐以使館遷到該地，取消對巴各種援助，包括對巴難民的人道主義援助，關閉巴解組織駐華盛頓辦事處，提出完全有利於以色列的所謂巴以衝突「終極解決方案」，被巴方所堅拒，這些是美在巴以衝突七十年歷史中從未有過的蠻橫無理之舉；強化打壓敘利亞，假借名義多次對敘進行狂轟濫炸，在敘駐軍增至兩千多名，實際上在敘建立了一塊「他人莫入」的美國「飛地」，即一定意義上的「國中之國」。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還加緊籌組「地區國家反伊（朗）同盟」，即建立以海灣國家為主的阿拉伯遜尼派國家反伊、敘等什葉派國家的聯盟，以更有力和有效地打擊和搞垮伊、敘政權並借此同俄、伊、敘陣營抗衡，增強其在中東同俄爭奪的實力地位。特朗普政府在中東如此全面推行極端強硬的霸權戰略，為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來美歷屆政府所僅見。

特朗普所作作為空前地激化了地區各類矛盾，嚴重攪亂和惡化地區局勢，使之陷於多年來罕見的緊張動盪以至戰亂危機之中。

其一，打斷了巴以和平進程，使巴以衝突再起。特朗普的中東政策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問題，而是站在以一邊欺壓巴，使自己自動失去了調停人資格，巴憤而拒絕美的調解作用，並以美違反國際法而將其告上國際法庭，巴以和平進程被迫中斷。以有美的支持更加有恃無恐地打壓巴，鎮壓巴和平示威民眾，特朗普上台前相對穩定的巴以局勢變得流血衝突不斷。

其二，挑起並加劇地區兩大集團的矛盾和對抗。美拉攏沙特

為首的阿拉伯遜尼派國家介入敘利亞戰爭和反伊（朗）行動，並策動前者籌建反伊（朗）聯盟，勢必擴大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國家同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國家的教派矛盾，使兩派更不相容以至對立對抗長期化。

其三，嚴重衝擊了防核擴散體系，危害了地區和全球安全。伊核全面協議是經過世界主要大國和伊朗等六方長期艱難談判而達成的，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理想選擇。特朗普政府說廢就廢還要對伊施以極限制裁，就使這一協議的存廢成疑，如伊最終得不到因棄核而應得的實益，它隨時可以退出協議走上重新研發核武之路。

其四，升高大國碰撞的風險。中東是美俄當前地緣爭逐的焦點。美把伊朗敘利亞看作中東僅存的兩個敵對和異己國家，對它們強力打壓和實行政權更迭是其東政策的主要目標。俄則力挺伊大力扶持敘，使美不敢對伊敘痛下殺手。特別是敘是俄在中東唯一的勢力範圍和戰略立腳點，不容有失，因而根據主權國家敘政府的請求，出兵維護敘政權，幫其收復絕大部分國土。但美及其盟友以色列對敘侵犯和不斷狂轟濫炸，嚴重危害俄盟友敘的主權與安全及俄在敘的軍事存在，俄決予反擊。現在敘戰已到最後關頭，俄領導的敘伊陣營勢將乘勝進擊，一舉解放敘全境，而美領導的反敘聯盟則決不會退讓。美對敘的非法直接軍事干預很可能招致與俄在敘短兵相接以至發生軍事衝突。

特朗普強硬為連任鋪路

中東是世界主要產油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確保獨霸中東是美稱霸世界的一個關鍵環節，也是冷戰後美國歷屆政府一個主要外交政策目標。特朗普政府在中東推行超強政策固然是從美的霸權利益出發，但也挾帶個人「私貨」即個人利益考慮。鑒於近年來美國內保守民粹勢力上升，猶太人財團在美政治經濟媒體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特朗普認為他在中東越強硬越親，越同俄對着幹，就越能顯示美國的強大，越能贏得美保守民粹主義和猶太人的心，這對他安渡「通俄門」和使共和黨贏得中期選舉和他本人獲得下屆總統連任極為有利。

但願美政府能記取前車之鑒，反躬自省，從霸權狂歡中醒悟，停止做損人損己之事，則中東幸甚，美國幸甚，國際社會幸甚。

劉小麗「預了」不符合參選資格？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自從姚松炎在2018年3月11日九龍西立法會補選敗走後，沉靜的劉小麗變得活躍，與此同時，新界西的李卓人同降九龍西。本來屬於不同軌道、不同時空的她與他突然走得很近，在同一時空下併軌成為「劉小麗孖李卓人」，隨即引起政壇人士的猜想。

猜想一：反對派放棄民主的初選機制，李卓人就是「PLAN B」人選。早在今年1月份，反對派推翻自己制定的初選機制結果，排斥「PLAN B」的馮檢基，已有聲音要以李卓人取代。這一猜想很快就得到證實。他們的說法是以「集體共識」決定由劉小麗自行安排「PLAN B」人選，連「民主」都不敢提。馮檢基等人批評是「欽點」。

猜想二：劉小麗和李卓人將發展出更緊密關係。劉小麗以「小麗民主教室」的名義「嫁給」李卓人創立的「工黨」，使得她與他的關係變得不再分你我，你即是我，我即

是你，派誰出來選，都是工黨的事，與其他無關，民協等政團想派人競選「PLAN B」人選，「誰都唔使諗」。

猜想三：反對派擔心劉小麗不符合成為九龍西立法會補選候選人的資格。這正是反對派真正擔心的。曾經劉小麗在她的衣服上都別有黃色的「決」字，到處招搖，突顯她對「本土」和「自決」的支持和決心，後來悄悄地摘了下來，以期政府選舉主任放她入關。

劉小麗和李卓人採取「孖公仔」的選舉策略，自稱為「麗人」，也有人笑是「小人」。其好處是同時宣傳兩人，及早讓公眾認識，可節省經費，更可打消那些想要初選定「PLAN B」人選的念頭。據聞，反對派有人對於兩人過早「打仔上」很有保留，此舉等同向公眾傳遞了一個政治信息：反對派陣營本身已認為劉小麗不符合參選資格，李卓人時刻準備着。

期望施政報告改善福利政策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香港人均生產總值達4.6萬美元，位處世界前列。不過眾所周知的是，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況同樣嚴重，2016年堅尼系數是0.539，雖則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減至0.473，但仍屬高企。因此，政府除了要專注發展經濟，同樣應在施政報告公佈適當的福利政策，讓市民真正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首先是長者福利，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在高盈餘下仍有能力改善及強化長者福利。隨着大灣區規劃落實及高鐵開通，長者在內地安居或跨境生活已成大勢。筆者建議將廣東計劃及福建計劃推廣至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長遠應取消生果金的離港限制，讓大半生貢獻香港的長者可落葉歸根，不用為生果金舟車勞頓。另外，應擴大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內地醫療機構，便利生活。此外，現時不少長

者在60至64歲已退休或因健康問題失去收入，出現福利真空期，故政府同樣應將2元乘車優惠及醫療券受惠年齡下調至60歲。

此外，兒童乃未來世界的主人翁，不過基於養育成本高，且對社會前景未感樂觀，不少夫妻對生育卻步，加劇人口老化問題。故政府應推出一系列的措施鼓勵生育，包括設立新生代儲蓄基金，協助新生代應對進修、置業等問題；設立兒童醫療優惠券，減輕家長為兒童求診所帶來的經濟壓力；與更多坊間機構合作增加託兒服務，讓家長可安心工作；並且提高有薪產假至14周，讓孕婦有更多時間可休養及照顧初生孩子。最後，亦應盡快將有薪勞工假增至17天，讓更多打工仔享天倫之樂。

總括而言，香港不應只追求經濟增長，卻忽略市民的生活質素，必須積極推動上述建議，讓市民的生活可在經濟發展中真正得益。

財政金融「雙箭」齊發穩預期

張敬偉

「十一」黃金周後，財政、央行「雙箭」齊發。財政部部長劉昆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強調，今年減稅降費將超1.3萬億元，正研究更大規模減稅降費。中國人民銀行7日決定，從10月15日起，下調部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降準可釋放增量資金約7,500億元（人民幣，下同）。

之前，財政部和央行曾陷入財政、貨幣政策之爭。現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正以「雙箭」齊發來穩定今年的市場預期。但在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市場對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維持「中高速」增長還有疑慮，對於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是否動力強勁也有懷疑。全球貿易摩擦加劇，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節奏也要適當調整，穩增長、穩預期的任務更為迫切。在此情勢下，積極的財政政策應該更加積極。

一是減稅降費。從營改增開始，中國減稅降費已經持續多年，而且正從市場領域深化至民生層面。前者在於減輕市場主體的負擔和提升企業活力，後者在於提高民生品質和提振內需動力。新經濟周期，主要大國都在通過減稅來提升本國市場競爭力及實現本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像中國這樣持久減稅減費的國家，並不多見。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5年中國宏觀稅負為29%，世界各國平均水準為36.8%；2016年中國宏觀稅負為28.2%，2017年為27.2%，連續兩年下降。全球資本是流動的，中國稅負降下來，不僅有助於吸引更多外資，也能有效阻止在華資本外流。

今年減稅降費規模將超1.3萬億元，給市場帶來穩定預期。特別是，「十一」後中國工資階層將享受到個稅起徵點提升到5,000元後帶來的減稅喜悅，雖然減稅不多，但也是普遍的民

生福祉。

二是加大財政支出。今年財政支出重點用在以下方面：一是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促進這些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補上區域財政保障能力薄弱的短板。二是投向扶貧和污染，通過精準扶貧挖掉貧窮根子，解決大氣、水、土壤污染的頑疾。三是加大民生領域經費支出。四是加大對重點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如生環境保領域和創新驅動行業。此外，今年財政支出增速，也預計超過年內GDP增速。由此可見，積極的財政更積極，並非當年大水漫灌式的4萬億元大投資計劃，而是財政支出的精準投放。減負與補短相結合，積極財政才能發揮出積極效應。

降準釋放出來的7,500億元流動性，重點投放於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解決其資金不足和融資難問題。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和實體經濟減少資金，是中國市場的老大難問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無論降息、降準還是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釋放的流動性都未徹底解決資金精準投放的難題。經過改革紅利的釋放，以及積極財政政策的支撐，繼續向急需資金的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輸入流動性，會發揮更好作用。此外，由於實體經濟增速放緩，第三季度經濟增長或降至6.6%，第四季度回落至6.4%。在此情勢下，釋放流動性也是穩增長的必要舉措。

值得一提的是，央行降準和美聯儲9月底的加息也形成了「逆周期」。這是為了扭轉美聯儲加息帶給新興市場股價匯「三市三殺」的頹勢，也是向全球展示中國市場的信心，即中國有能力通過獨立自主的財政和金融政策調整，向世界傳遞中國經濟的韌性和穩定。

恢復雙黃金周可解假期擁堵

敖敏輝

國慶黃金周剛剛結束，結束假期回歸崗位。這7天和往年一樣，高速公路堵車和旅遊景區人山人海，這已成為近年來國慶假期的例牌。想想廣大車主、遊客，說起來都是「累」。國慶长假被人詬病，對於是否可以重新恢復「五一」、國慶雙黃金周話題，偶見討論。

1999年，我國將國慶、「五一」三天假期，與假期前後兩個雙休日進行拼接，組成兩個超級黃金周。2007年，因為增加清明假，「五一」黃金周取消，回歸三天制假期。然而，由於全年只剩下一個黃金周，且10月正值旅遊旺季，導致休假和外出旅遊需求集中釋放。高速公路和景區車滿為患、人滿為患，並不意外。特別是2012年高速公路假期免費政策推行，堵車問題更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治理假期的堵和擠，以及帶來的其他一系列問題，重在「疏」。在筆者看來，關鍵一招，是改變現有黃金周休假格局。在我看來，清明

假和端午假、中秋假一樣，功能性比較強，出行目的相對單一，「五一」和國慶假期則是真正的旅遊消費假，沒有必要因為增加了一個功能性假日而縮減「五一」假期時間。

因此，可考慮恢復「五一」和國慶雙黃金周制，並將休假日數調整至5天。一是兩個假期分別在春夏之交和秋冬之交，氣候不同風景不同，每個人會因個人愛好，在兩個假期之間做選擇。二是10月是多數行業的生產旺季，增設「五一」黃金周，職工全年休假靈活性更大。第三，長假短缺，是我國長期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在當下旅遊業發展及居民消費升級雙重供需矛盾下，設置雙黃金周，不是沒有必要。

至於5天制，則完全是為了保證不額外增加全年公眾假期天數。如果繼續維持2007年之前那樣兩個黃金周各7天假，相信公眾也十分樂見。